

■新作聚焦

严歌苓长篇小说《赴宴者》面具背后的“伤”与“逝”

□戴瑶琴

一件化纤合成的西装外套、一条卡其裤、一副五块钱的宽边平光眼镜、一只 20 块钱的麦克风、一台基本报废的录音机、一个照相机遗体,这是董丹“赴宴”的行头,也成为了董丹的“面具”。严歌苓的小说《赴宴者》就是通过一位下岗工人紧张刺激的“伪记者”经历,铺展开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人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赴宴者》是严歌苓作品中信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下岗、宴会虫、按摩女、新闻造假、农民工、房产泡沫、官民纠纷、艺术庸俗化、婚外情、人体盛、高干子弟,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和热门事件,在一部 2006 年构思完成的小说中竟然被一网打尽了。严歌苓贯彻了她一如既往的创作上的诚恳态度,进行对人生酸楚的表达和人性复杂的揭示。《少女小渔》如是,《花儿与少年》如是,《小姨多鹤》如是,《赴宴者》亦如是。

《赴宴者》讲述了一个源自真实生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下岗后的董丹苦于生计,在应聘酒店保安时,意外被错认为赴宴记者。无惊无险的初次“赴宴”,让他发现了一个好营生,于是他伪装记者,成为专职的“赴宴者”。又是一次阴差阳错的对话,让他与著名画家陈洋结识为知音,并被自由撰稿人高兴误作是大师的密友。董丹将错就错,在他与高兴的合作中,他以记者身份接触了社会的多行多业多人;按摩女、追讨薪水的农民工、卖血中冤的老农民、狡猾的地产商、嚣张的高干子弟、麻木不仁的新闻媒体。为了让妻子小梅也享受白来的高档

■看小说

陈继明《每一个下午》一滴水珠见世界

作家陈继明说,好小说是球形的,饱满的,可以从一万个角度去研究,而所谓主题,通常都是一厢情愿被总结出来的。这句话似乎可以用来评价他的中篇小说《每一个下午》(《黄河文学》2009 年第 10 期),而我也只能“一厢情愿”地归纳出一个“概要”。小说的背景依然是西北大地上的一个村庄;在城里做局长的连臣是村里的“活菩萨”,对村里人不摆官架,“有求必应,有忙必帮”。连臣的母亲不行了,送回村里的老家,每天一瓶氧气吊着等着咽气。这对晚晚是一个刺激,因为她三个月大的儿子得了白血病,无钱医治几天便死去。晚晚因此落下心病,并暗暗恨上在危急时刻没有出手相救的连臣,甚至起了拔掉连臣母亲氧气瓶的念头,因为一瓶氧气 740 元,相当于三亩地一年的收入。然而,拔掉氧气瓶的却是自己的公公四十一。当晚晚听说连臣家一夜丧礼就收了 60 万,再次自杀又被救起,这次她彻底清醒,参加了葬礼。连臣在隆重安葬母亲后,将老家的院子捐给村里,彻底将“根”拔除。在作者“较为轻微、隐忍、单纯”的叙述中,一个农村普通丧事在农村日常生活劳作中被讲述得“风起云涌”,犹如一滴水珠,折射出社会的许多方面,其中,村里各种人的心态可谓最为真实饱满。无论是大写特写的晚晚,还是墨不多的连臣,以及四十一、小琴等人物的心理都让人寻味再三,也让人看到陈继明的心理刻画功底。

石舒清《杂拌·小事情》平凡让人“惊诧”

《杂拌·小事情》(《人民文学》2009 年第 10 期)与石舒清近两年来发表的其它短篇小说如《小说二题:李满成、大舅》《阿舍》《父亲讲的故事》《果核——记邻村的几个人》等相似,依然专注于“存贮在我的记忆里,不随时光流逝而磨灭的那些人和事”。博尔赫斯曾说,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在石舒清笔下,这些平凡人与平凡事也让人“惊诧”。《杂拌》写了父亲日记中记叙的一些人与事;陈大大、小朋友、爷爷、讨债等,展现了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爷爷带父亲到兰州、上海做生意的一些生活片段。在作者近乎白描的叙述中,这些人和事“杂拌”在一起,犹如一幅幅民间风情图,寥寥几笔,人与物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小事情》则写了三舅讲的有关燕子、瞎瞎和猎隼三只动物的故事,虽然这些动物没有语言,也没有人的表达方式,但它们的亲情、机智、勇敢与抵抗,同样也带来生命的感慨,也正是在这些点点滴滴中,西海固人坚韧、诚信、友好、恬淡的性格更是得到显现。

了一容《一只花布包》一个有关生命的寓言

“流浪”是了一容小说的一个主题,《一只花布包》(《山花》2009 年第 24 期)依然继承了他《沙沟行》《历途命感》《在路上》等早期小说的典型主题和特点——写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底层人物在生命极限处的奋斗。显然,与其它“流浪”小说相似,《一只花布包》也带有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与真实感受:带着一只用碎布片缝缀起来的布包四处流浪的少年穆萨,被骗到巴颜喀拉山西端的一个金场子做金娃子,在目睹好友尔里死后,他带着一块捡来的金疙瘩开始逃亡,最后九死一生,终于得救。此时,他身边只剩下妈妈给他做的一只花布包。在作者颇见风骨的柔韧叙述中,小说犹如一幅幅生硬粗犷的黑白木刻画版,悲郁苍凉,一个逃亡少年的孤独与挣扎,然而而出,这让小说超越了故事而成为一种对生命的思考:孤独的穆萨逃到山谷绝境后,面对“世上最令人恐惧的黑暗与囚禁”,开始了挣扎与思考:是不是该放弃那块金子?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又是什么?最后,放弃了金子的穆萨获救了。没有人相信他的故事,这让小说犹如一个生命的寓言,也让小说中叙述的苦难、不公与死亡得到升华,指向了更为普遍的意义——活着的意义。(罗四鸽)

本版责编:刘 颖 刘秀娟

·文学批评·

孔雀肉、干蟹指、鱼翅海参、人体宴,正是对他们的嘲弄和批判。底层劳动者在望绝地渴求着自己的权利。过期罐头、四川泡菜、烧羊肉、红薯烧酒,正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尊严成为了他们满足基本温饱的奢侈消费。董丹用语言和拳头,显示了弱势群体重拾尊严的决心。可是,董丹的捍卫也是不彻底的,小说结尾,董丹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似乎暗示着他的逃离,对精神尊严的放弃。罗兰·巴特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每一处描写都在表达一种观点,严歌苓对董丹最终命运的处理某种程度上也流露了她对现实的些许悲观。

奴性与血性是小说思考的一个难点。人生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纠缠在一起。因此,奴性与血性共同交织在董丹和陈洋的性格中。他们都戴着面具扮演着弄臣,面具纵容了他们的奴性,打压了本该张扬的血性。“戴上了面具,人们就变成本来他绝不可能成为的个体;男子变成女子;老人变成青年;人变成动物;凡人变成神仙;死人变成活人。面具成为社会和认识生活中本质的对立面之间的媒介。”(〔美〕J·C·克劳克:《庆典中的面具》)面具具有自我的消解性,它的副作用在于培植了自我的寄生性,人日益物化、机械化,因此造成了人的人性矛盾和人格分裂,同时它也掩饰了沉默、谎言与暴力的共谋。面具囚禁了陈洋的自我,释放了他的奴性,只有当他醉酒的时候,才让人看到他的本真。他谩骂,他哭喊,但他又不敢在众人面前摘下面具,因为失去了面具的保护,他会面临牢狱之灾,而地位、崇拜,乃至他一直享受的艺术独裁,都一去不复返。董丹不同,戴上面具之前,犬儒是他的生活姿态,在现实的高速路上,他和小梅一直以乌龟的速度散步。而戴上面具,为他的人性乍苏提供了契机。玲珑炫目的现代生活煽动了他的生存热情,并敦促他逐步发现失落的血性。他敢于替农民工讨薪,主动拒绝虚假宣传,制止朋友对朋友的出卖,并替蒙冤的农民伸张正义。小说中连结董丹和陈洋的重要媒介——西北的辣椒椒,在刺激董丹味蕾的同时,也催化了他血性的迸发。

到这里,我们才明晰起来,《序类之关于》是关于序类的思考;秩序改变了,现代性带来的混乱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物的丰盈,带来了部分人的舒适、便捷和好心情;但作家对“现代”没有边界的发展,对不可收拾的“现代”后果的忧心忡忡,表达了她坚决的批判和抵制。

如是看来,《序类之关于》就不简单了;当杜冰冰重返先锋文学的时候,与上世纪 80 年代先锋文学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80 年代,文学与政治的胶着关系一直困扰着我们,正面触及的困难几乎没有办法超越。先锋文学成功地通过形式的意识形态突围,终于打破了文学与政治纠缠不休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80 年代的先锋文学不只是对欧美强势文学的致敬,同时也有改变本土文学状况的策略性因素在里面。但是,到了杜冰冰这里,或者说在后先锋时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改革开放 30 年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在创造了新的历史的同时,也无形中书写了另外一种历史,这就是混杂的、迷乱的、与狼共舞没有方向感的心灵史。这个现实是《序类之关于》产生的生活依据和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序类之关于》在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但在内容上却与现实主义有血缘关系。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小说中的迷乱、荒诞和貌似混杂的章法,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反映。杜冰冰对音乐、美术以及影视等良好的艺术素养,也使她具备了良好的“先锋性”的文字感觉和表述能力,而她对现实关怀的内心诉求,更是我们乐于看到并支持的。

■第一感受

后先锋时代的先锋写作

□孟繁华

看到杜冰冰《序类之关于》这个书名,没有人会想到它是一部小说,但它确实是一部小说。但这又不是我们通常理解或阅读的那类小说,它有鲜明的先锋文学气质,没有连贯的情节,也没有贯穿性的人物,现实与虚构交织,理性与荒诞并存。表面的凌乱和碎片化,犹如行走在没有方位的荒原夜晚,慌乱不安中既无迹可循又迫不及待。小说杂糅了先锋文学的多种元素,隐喻、意识流、精神分析、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种表现形式。因此,要全面地破译《序类之关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应该承认,这是一部精心构筑的长篇小说。它表面的没有章法或有意为之的叙事迷障,并没有淹没叙事者的现实关怀。

西西与向东是两个艺术家,但他们的艺术怪异得令人匪夷所思:他们用特制的布料包扎天安门、中南海、景山和所有能包扎的东西,接着再做关于拆的行为,然后创作了轰动一时的《表情》并获了大奖。这个作品就是拍下社会各类各阶层男人阴茎的不同状态,他们认为那是有表情有语言的东西。于是他们被认为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地景艺术、影像等跨媒艺术家。这些怪异的行为在八

九十年代曾风靡一时。这一对曾被称为艺术界“神雕侠侣”的情人突然有一天发生了情变:当西西从香山行为艺术现场返回家时,她被向东告知“不爱她了”,他爱上了一个男人。然后小说突然转向“底层叙事”,民工讨薪、静坐示威、街头斗殴、结伙抢劫,社会上五行八作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一度出现的主角名曰“玻璃美人”,这是一个欲望符号,是这个欲望使世界完全改变了模样。当然,令人不安的不止是抽象的符号化,还有生活更具体的事物:敌敌畏泡的鱼干、含有甲醛的毒蜜枣、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水果,巨毒“无公害”蔬菜、“瘦肉精”饲养出的瘦肉型猪肉、喂避孕药的黄鳝、用牛血兑洗衣粉做成的鲜嫩“鸭血”……各种诈骗,到处陷阱,没了秩序,没了章法。更为离奇的是,西西被母亲告知,男人要灭掉所有的女人;“关于灭绝女人的做法一些男人是持不同意见的,他们认为奴役女性比灭绝女性更好,但最终以压倒多数占了上风的男人认为,目前正因为女人的发展威胁到了男人生存,占有了本应属于男人的资源。还有一种说法:灭绝女性是为女性掌权,把男人从萎靡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荒诞。读

喝彩的,却甘愿做一个众生狂欢、独淡冷水的人。他愿独自守着曾经的精神家园,可却不能不让人感到无家可归的悲凉。

“冒犯”这个词有着大不敬和蛮野之气,可胡野秋却是一个儒雅的“冒犯者”,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执著的坚守者,是对当下“伪文化”的挑破和批判,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呼唤和守护。他自身更有着传统文人的气质,为文机智、幽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有景渊博的儒雅气象的“胡腔高调”。在《历史这个小姑娘》一文中,揭露当下电视、媒体对历史的歪曲和荒谬的虚构,呼吁珍爱民族以往的历史;声明自己愿作文学的仆人,会快乐一生。《我做“星期五”》他娓娓而叙,担忧而不流于伤感,批判而不流于激愤,使感性 with 理性的表达更能伸张自如,他的整个心灵在这些文章中展露无遗。心灵深处对真正的现代文明的渴求、无法驱散疑虑和担忧,成为他文章中常见的主题,那种高贵、深邃的沉思和无法抑制的忧虑深深地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文人气息使人为之感染。在朴素晓畅的文字背后,蕴涵着深刻的时代思考和浓厚的责任感。

当下文化是空洞的、浮泛的、枯萎的,“经典被流放,大师远去”(《经典的被流放》《大师时代远去》);因贫瘠的土壤开不出绚丽的文明之花。可作者没有丧失对未来的期待,而像一个“灯塔看守人”那样去坚守,努力,不遗余力地推行着读书的活动。在作者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上升还是沉沦,就看读书的情况,读书应该是像信仰一样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去。在跋中,胡野秋坦诚所敬仰的是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这些真正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且朝着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固执地努力,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做现实生活中的西西弗斯,在人类精神家园最后的堡垒上捍卫着陈旧而尊严的旗帜。

三角楼上的跨时空对话

□闫立飞

跟随雪屏的《敲敲门》走进他的三角楼,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过去与未来交融、梦境与现实混淆、幻觉与事实对接、生人与死者对话的异度空间。无疑,这是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三角楼的破败昭示了它与现实的距离。在这个鬼魅游走、呓语与对话的异度空间中,雪屏不仅以全知视角展示了关于爱情、疯狂和死的故事,而且也从中发掘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从历史的角度为这则异想故事注入了深层意义,这也使其与时下流行的穿越类网络小说区别开来而具有了“后先锋”的意义。

“三角楼”的故事发生在天津,叙述了从北洋军阀时期到新世纪祖孙四代人的生活与爱情。当“我”因与我那姐失恋走进这座破败的三角楼时,意外发现自己原是这个大家族的小少爷,因此他不仅进入到那个时代,经历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而且以梦想穿梭的方式见证了这些事情的前因与后果。曾祖父穆确原是一个农民,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加入到吴佩孚的军队,因作战勇敢而擢升为小头目,遇到曾祖母雅儿以后,他不仅由军人变为寓居津门出入交际界的绅士老翁,而且攫取了雅儿的所有财产,经营着多种产业,并续娶了两房姨太太,成为这个大家族的开创者。他与曾祖母及其两房姨太太的交错关系成为所有故事的起因,祖父与祖母、父亲与母亲,包括“我”与“我那姐”,这些人的爱情经历与生活道路都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成为它的结果。在这个因果链条中,祖父与祖母成为这个家族的叛逆者,他们以出走

■言 论

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而言,到底该什么时候写长篇小说才好,是写作的最初时候,还是中期或后来?经过多部长篇小说创作的历练,我觉得其中确有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对于阅历丰厚、学养深厚的人,他们无论什么时候创作长篇小说,都可以佳作迭出。那是因为他们不但有了相当的驾驭文字和谋篇布局的功力,更重要的是对生活、人生和世界乃至文学本身,都有了深刻的洞察、体会和认识,也可以说,已经具备了用这种艺术的形式调动丰富积累、表达辽阔心声、阐发人生见解和实现美学追求的澎湃激情、思想深度、创作功力等等雄厚资本。

然而,如果这些方面还存有虚愚和疑虑的话,那么就最好先去写诗歌、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写中篇小说或其它诸种体裁的文章,去磨练、丰富、锻造自己,当然不只是在文字、结构和审美能力方面,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阅读层次的攀升、思维领域的拓展和思想深度的开掘方面。当这些条件都已具备之后,再去驾驭长篇小说,可能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顺理成章的事情。否则,侥幸上路,要么如履薄冰,要么捉襟见肘,要么一头雾水,待得到力不从心或难以自拔之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将会耗去多少读书、学习乃至打拼人生当紧之事的宝贵时光。万一处理得不好,就会一蹶不振,也有可能从此销声匿迹。

还有一点也不可忽略,就是要知晓“行情”。也就是说,只有知道了中外文学的发展路数、制高点,知道了自己创作时候的观照视野和禁忌之处都是些什么,在哪里,才能清楚自己的落脚点该在哪里、该是什么。换句话说,只有对文学疆域的浩瀚无限和峰高谷深有了充分的认识,对创作之河的来龙去脉和惊涛骇浪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一旦创作起来,才能绕过“雷区”、“暗礁”和“怪圈”,也才能独辟径蹊、左右逢源和游刃有余。最可怕的是,很多时候自以为是的拥抱住了最新颖的生活素材、故事情节,表现手法和思想见解的炫耀性,而实际上它们却早已被他人曾经反复表现和使用。一旦进入这个误区,要想突破出来,又是何其艰难啊,因为你所要战胜的,几乎是这个领域里所有先行者的建树。

谈到什么时候写长篇才好这个大问题,还有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在悄悄地等待着您——那就是到底要写什么。我的体会是,还是要写自己感受最真与最深的东西,这种感受不可能从类似蜻蜓点水似的采风或浮皮潦草的所谓深入生活中得来。我所说的最真和最深的感受,却是离不了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当然最好是能“生死攸关”一场的那样一个艰难过程。确切地说,决不单从表象而平静的生活中就能得到,而常常是有关生命或命运的一种无法言说、无法理清而又无法摆脱的杂沓杂味的体验。在那种情境中,你往往都搞不清自己到这世界上究竟干什么来了,可能就是专门克服困难来了。于是,一切的有关于意志的磨练、能力的获取、勇气的增添、思维的拓展,都仿佛只能在这样的排除困难中产生。于是,就连自己整个人都像是在这种排除困难中逐渐变得强大和成熟起来。

这种“炼狱”一般的感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确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许多真知灼见,都可能从这里孕育和诞生。一旦拥有了这样一种坚实的生命体验,你就如同得到了一把万能的关键匙,或一把所向无敌的宝剑。只要以它为基础、为底垫、为依托、为手段、为力量、为勇气,而后稍加武装,你就会有胆魄向任何一个陌生的领域进军了。因为你已经懂得了没有痛苦的蜕变,就不可能会有一个新我的诞生;因为你已经明白了生活的复杂本色和它的不可捉摸;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生命的强大能量和脆弱底线。而这时候,理性的高度,就是激活你所有沉寂素材的引信。那简直就像是一种可以起死回生、可以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可以直达任何理想境界的特殊号角,正是因为它的触及、呼唤和引领,所有的细节、情节、人物、故事,乃至语言的队伍,都会立马被唤醒和组织起来,都会以最富有使命感、最富有担当意识、最富有超超气魄、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形式组织起来,朝着你所向往的精神和美学高地,浩浩荡荡信心百倍而去。

的方式保卫了自己的爱情,获得了独立。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则代表了激情燃烧年代共和国军人与小资产阶级女学生的爱情特点,这也是祖父母亲谋求改变自身阶级血统的主要出路。而“我”与“我那姐”的爱情,是典型的先同居后结婚的现代爱情,它不仅早已为曾祖一代人所预言,同时也是“我”打破时空间隔进入三角楼的契机。

三角楼的世界里,除了“我”之外都是曾经在三角楼呆过的人的鬼魂。但他们的确在对话、交往和回忆,同“我”诉说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爱情经历,这种取消生死界限、时间间隔,“人鬼不分”的手法,颇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事实上,雪屏毫不讳言他对胡佛·鲁尔夫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欣赏和借鉴,破败的三角楼仿佛就是《佩德罗·巴拉莫》中那个“混无人烟,鬼魂昼行”的山村,在曾祖父淳朴憨直与狡诈多疑、民族节气与鲜廉寡耻、宽厚仁慈与好勇斗狠、见义勇为与冒险毒辣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格中,也闪现着佩德罗的影子,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过去将来时的语句,更昭示着它的拉美文学的渊源。因此,如果这部小说不是现在,而是在二十多年前文学狂欢的时代出版,肯定会引起较大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我把它称为“后先锋”小说。

当小说中的“我”在三角楼上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而无法回到现实世界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为小说的故事所深深诱惑,为他们的爱情、疯狂与死亡所缠绕。这也是这部小说成功之所在。

什么时候写长篇小说才好

□查 舜